

回顾与展望：哈佛燕京学社的百年沉浮

〔美〕裴宜理 吴和林

〔编者按〕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以下简称“哈燕社”）于1928年春由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的遗产基金资助创办。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哈燕社致力于在东亚和东南亚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①虽然哈燕社同哈佛大学关系密切，但它在法律和财政上其实是独立的。它主要通过向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

目前，哈燕社正在开展的主要项目包括四类，分别是：（1）面向亚洲地区合作高校教师的访问学者项目（Visiting Scholar Program）、哈佛燕京图书馆研究基金项目（Library Research Grant）、波士顿学院利玛窦中心-哈燕社联合访问学人项目（BC Ricci Institute-HYI Joint Visiting Researcher Fellowship Program）、哈燕社-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联合访问学人项目（HYI-Radcliffe Institute Joint Fellowship）等；（2）面向亚洲地区合作高校研究生的印度的中国学项目（Chinese Studies in India）、中国的印度学项目（Indian Studies in China）、新加坡国立大学-哈燕社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NUS-HYI Joint Doctoral Scholarship Program）、哈佛大学东亚区域研究硕士项目（RSEA）以及学术集训项目（Training Program）等；（3）面向哈佛大学教授的邀请亚洲高校学者来哈佛从事合作研究项目（Coordinate Research Program）；（4）面向哈燕社校友的多种项目。

2013年值华中师范大学110年校庆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与哈燕社恢复

^① 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参见其官方网站 <https://www.harvard-yenching.org/history-of-the-harvard-yenching-institute/>。

了中断60余载的合作关系。^① 华中师范大学开始向哈燕社推荐访问学者项目、研究生访问项目 and 中国的印度学项目（包括访问学者和访问研究生）候选人，并持续接收了由哈燕社遴选的印度高校博士生到校学习汉语。此外，华中师范大学还与哈燕社联合举行了“回顾与展望：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2019）^② 和“本土经验与跨国视野：近代西方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2020）等国际研讨会。

2023年12月，值哈燕社与华中师范大学恢复合作关系10周年之际，时任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应邀接受访谈，回顾学社的发展历程，分享在她领导下学社的新突破与新进展，并解读学社的最新动态。2024年7月，裴宜理正式卸任哈佛燕京学社社会一职，为其长达16年的卓越领导生涯画下了圆满的句号。目前，她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座教授，是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1948年，裴宜理出生于上海，父母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教授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1951年，因父母前往日本东京立教大学任教，她在日本校园中度过少女时期。1965年，她在美国纽约州就读于威廉史密斯学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又称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1969年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78年获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政治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亚利桑那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等。1997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政府系，并先后出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及亚洲学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中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和政治等。她于1993年出版的著作《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获国际劳工史协会“优秀著作奖”，并于同年获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费正清奖”。其他专著还有《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中文简体版20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2012）等。

以下为访谈内容。

① 关于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的华中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合作与影响，参见马敏、吴和林《哈佛燕京学社与华中大学人文学科历史关系述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马敏、吴和林：《抗战期间华中大学的西南边疆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② 蒙应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吴〕裴老师，您好！今年（2023）11月初，《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您的专访《研究中国革命，如此复杂，如此迷人》一文，引起了广泛关注。通过此文，人们了解了您个人的成长故事和研究方向之缘起。今天的采访，我希望听您讲一讲您所领导的哈燕社的项目构想和运作机制，让读者了解您的学术生涯的另一面，即您领导学术研究机构的历史。哈燕社成立于1928年，五年后贵社将迎来百年庆典。因此，我想邀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哈燕社成立的往事、哈燕社历年来的重要项目以及在您的领导下贵社的发展以及未来的期待。

〔裴〕好的，非常期待。

〔吴〕对中国乃至亚洲地区而言，哈燕社也许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最知名的机构之一。不过，因为其机构名称中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哈佛”，另一个是“燕京”，人们对哈燕社有着各种猜想，许多人并不了解设立这个机构的资金来源，谁是主要的捐助者以及捐赠之初的愿望是什么。您能简单谈一下吗？

〔裴〕哈燕社的捐赠者名叫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他是美国铝业公司（Alcoa）的创始人。他发明了一种廉价的制铝工艺，并申请到专利而获得巨资。霍尔本人并没有在哈佛大学或燕京大学接受过教育。实际上，他是在美国中西部的一所小型文理学院——位于俄亥俄州奥柏林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上的大学。那是一所基督教文理学院。他在那里接受了本科教育，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学习中养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帮助他日后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科学发明家。我记得他在奥柏林学院主要是研究化学，但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而且他有好几个亲戚都是传教士，其中，一位姐姐和一位姑姑还曾去中国教书。因此，家人的言传身教使他对亚洲特别是中国及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于他的（捐赠）愿景，一是支持文理教育，因为基于个人的成长经历，他相信这种教育至关重要；二是要做一些推崇中国文化并向中国以及亚洲地区施以援手的努力。起初，他只有非常宽泛且不太明确的想法——只是表明，留下的这些遗产将用于促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事业以及资助亚洲文理学科领域的高等教育。至于如何实现这一愿景以及如何构建相关机构等问题，都留给了他的遗产受托人来处理。

从1914年霍尔去世到1928年哈燕社正式成立，历时14年。其间，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都在努力争取霍尔指定的用来推进亚洲高等教育发展的巨额遗产。实际上，并非霍尔本人，而是他的遗产受托人决定将这个机构命名为“哈佛燕京学社”，并决定将主要办公室设在哈佛大学校园内，且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校园内设立一个分社（办事处）。

[吴] 这解释了霍尔与中国之间的一些渊源以及他建立这类机构的遗愿。能否请您再分享一些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之间建立联系并促成合作的故事？正如您提到的，这主要是由受托人理事会完成的吗？

[裴] 当然。霍尔先生的遗产受托人都是很杰出的人士，其中还有律师，他们的朋友遍天下。其中一个朋友就是时任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的华莱士·布雷特·多纳姆（Wallace Brett Donham, 1877-1954）。尽管他是商学院的院长，但他对亚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像哈佛大学这样的高校对于中国研究的支持太少，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实属遗憾。所以，多纳姆院长主动去找他在霍尔受托人中的那位朋友，试图说服受托人将所有资金投到哈佛大学。同时，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霍尔先生的受托人中也有这样的朋友，他也竭力说服受托人将所有资金捐给燕京大学。作为一种妥协，遗产受托人最终决定同时支持这两所大学。由于基金捐助者本人是美国人，遗产受托人认为这个机构的总部应该设在美国。因此，哈佛大学作为它的主要驻地和总部是合情合理的。当然，在中国设立一个分社或者说一个办事处，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他们在燕京大学也设立了办公室，成为支持哈燕社在两国开展活动的重要基地。

据我所知，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胡适先生说服霍尔遗产受托人接受了他的提议。胡适提出，哈燕社应该作为独立法人机构，既不附属于哈佛大学，也不附属于燕京大学。他认为，一方面哈燕社在两所校园分别设立办公室，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哈燕社的财务独立于两所大学，在法律上将赋予机构极大的灵活性、自主性和适应性，使哈燕社能够根据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我认为胡适先生的提议非常明智。这意味着哈燕社与哈佛大学（包括当时的燕京大学）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灵活可控，适应性强。为此，当燕京大学1952年撤销转制时，这种独立机制使哈燕社能与教会大学断开联系，并转向其他领域。实际上，如果有必要，哈燕社也

能随时脱离哈佛大学而转移至其他地方，谁也不能保证它会永远留在哈佛大学。哈燕社所拥有的这种机动性和适应性体制实属罕见，我认为这赋予了哈燕社十分独特的内涵。

〔吴〕原来胡适先生在哈燕社的设立中扮演了如此关键的角色，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据我所知，作为一个财务自由的独立法人机构，哈燕社的支持并不限于燕京大学，当时还有其他一些中国高校也从中受益匪浅。请问，当年还有哪些机构从哈燕社获得了资助？哈燕社优先资助的事项或领域是什么？

〔裴〕除了燕京大学得到哈燕社拨付给中国以支持其高等教育发展的大部分资金外，还有其他几所教会大学也得到了支持，包括广州的岭南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英文有时也称 Shantung Christian College）、金陵大学，还有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总部的哈燕社按年度先给燕京大学拨款，燕京大学再把这些资金分配给上述教会大学。当然，除了这些学校外，还有其他学校，包括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华中大学也得到了特别的拨款，用于考古发掘、人类学探索、民族问题研究等工作，并通过资助设立了图书馆和博物馆。哈燕社对这些学校给予资助的重点不是一般的文理教育，而是强调中国研究，尤其强调建立作为“中国文化价值储藏室”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因为这将为人类世代所留存。那时，中国正面临历史上一个极端动荡的时刻，充满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在这种社会巨变中，中国文化的命运无法预测。一个重大的变革近在眼前，中国伟大的文化宝藏将何去何从，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人们都对此忧心忡忡。因此，哈燕社的部分使命是支持建立强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以保护中国文化。

同时，由于自身的处境，教会大学也有来自另一个维度的关切。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为了体现自身的本土化，所有教会大学都开始积极推动中国研究项目。他们试图表明，教会大学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并坚信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价值。所以，我认为，保存中国文化的精华成了教会大学的共同意向。司徒雷登校长本人坚持一定要建立中国研究的学科领域，燕京大学在这方面的成果也确实独领风骚。在哈燕社的支持下，燕京大学得以从北京大学和其他国立大学聘请许多杰出的教授，因为燕京大学能够给这些教授支付更高的薪水。很

大程度上，这得益于它从哈燕社得到的年度拨款。而位于剑桥的哈燕社的观点与这些教会大学略有不同，因为哈燕社所念乃是中华文明的灿烂光辉，想竭尽全力保全这些遗产。这一点对哈佛大学也很重要，因为一旦成为中国文化的藏宝室或保存库，哈佛就拥有了一个精彩的收藏馆。如今声名远播的哈佛艺术博物馆^①里收集了大量的艺术品，其中一些是从敦煌等地带出来的，有些则是在特殊的境况下转运过来的。哈佛大学希望逐步实现世界级的中国艺术品和文物收藏，并使其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部分得到保护。所以，我认为，就两者的初衷而言，哈燕社的视角和中国教会大学的眼光，略有不同却又不谋而合。

[吴] 正如您所言，哈燕社的支持确实解了当时很多教会大学经费紧缺的燃眉之急。可以说，1952年以前，哈燕社主要关注中国，在中国研究和文化保存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哈燕社支持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许多当时的著名学者。这样说对吗？

[裴] 没错。不过，我还需要提及的是，当时哈燕社也支持了印度的一所大学[指阿拉阿巴德农业研究所（Allahabad Agricultural Institute）]。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哈燕社一直为它提供资助。另外，在支持教会大学的同时，哈燕社还支持了一个位于北京市中心却不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的中印研究所（Sino-Indian Institute）。^② 这是一个研究梵文经典并将其与中国佛教经典相比较的印度汉学研究所。当时，这个研究所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较视角，它关注佛经如何从印度引介到中国，中国文化又从印度吸收了什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是如何迁移和变化的。正如我所说，尽

① 哈佛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隶属于哈佛大学，由三座博物馆及四个研究中心所组成。其中，三座博物馆分别为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始建于1895年）、莱辛格博物馆（Busch-Reisinger Museum，始建于1903年）及萨克勒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Museum，始建于1985年）；四个研究中心分为萨第斯考古勘探研究中心（the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Sardis，1958年成立）、哈佛艺术博物馆档案馆（the Harvard Art Museums Archives）、斯特劳斯保护技术研究中心（the Straus Center for Conservation and Technical Studies，1928年成立）以及现代艺术技术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Technical Study of Modern Art，2002年成立）。1983年，上述三座博物馆整合为一个机构，名为“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2008年更名为哈佛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内有来自欧洲、北美洲、北非、中东、南亚、东亚及东南亚等各个地区的古今藏品约25万件。详见 <https://harvardartmuseums.org/>。

② 关于中印研究所，参见谢小燕、王蕾《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历史沿革》，《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年第4期。

管哈燕社的主要焦点是中国文化及其研究，但它也支持过其他的机构和项目。

再者，哈燕社的第一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 1889–1975）是在欧洲和日本接受的教育，但他也是一名汉学家。他能读古汉语，还会说日语，是第一个从东京帝国大学获得学位的外国人。他本人在俄罗斯出生，先在莫斯科学习，后去法国学习汉语，接受汉学的训练，最后去日本深造。后来，他来到剑桥，成为哈燕社社长。所以，哈燕社本身也是非常国际化的。

〔吴〕据我所知，叶理绥教授从哈燕社离任之际，正是中国大学重组之时，哈燕社面临新的挑战。第二任社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 1910–1990）不得不肩负起引领哈燕社新方向的责任。那么，在您看来，那个时期的哈燕社做了哪些历史性的决定或创新？

〔裴〕是的，我确实认为哈燕社是在赖肖尔教授的领导下进行调整的。赖肖尔本人在日本长大，他与司徒雷登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司徒雷登在中国长大，是一个传教士的孩子。赖肖尔在日本长大，也是传教士的后代。他们俩后来都成为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是美国驻华大使，赖肖尔则是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是由叶理绥教授带出来的，叶理绥教授是他的导师，赖肖尔在叶理绥门下接受汉学方面的训练。赖肖尔日语口语极好，也熟练掌握现代日语。他的研究涉及中日关系，尤为关注佛教从中国到日本的传播，并比较了中日两国的佛教经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也成为哈燕社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1952年，中国的私立大学被撤销并进行了重组，哈燕社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与亚洲高校继续开展合作研究。正是在赖肖尔的领导下，哈燕社首次引入了访问学者计划，旨在邀请东亚学者来美国进修。最初的想法是接收尚未完成高阶学位的学者，因为当时东亚大多数高校教师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哈燕社可以资助他们来哈佛大学开展项目研究。倒不一定是为了获得哈佛大学的学位，他们也可以在哈佛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从而得到额外的学术训练。由于当时哈燕社无法在中国大陆开展相关工作，所以，它开始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几年后，裴尔泽（John C. Pelzel）继任哈燕社社长。他是一位潜心日本研究的人类学家，但对东南亚也有浓厚兴趣。在他的带领下，哈燕社的合

作关系扩展到东南亚地区。20世纪80年代，在韩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的领导下，哈燕社设立了访问博士生项目（Visiting Fellows Program），即从博士生（特别是中国的在读博士生）中遴选青年人才到哈佛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返回母校任教。可见，过去几十年，哈燕社的项目类型和辐射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也反映了哈燕社社长的学术所长和个人偏好，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亚洲高等教育的变化以及哈燕社与亚洲合作关系的

变化。

〔吴〕是的，您把视线带到了我们更为熟悉的历史阶段。据了解，1954年以来，在哈燕社的支持下，超过1200名来自亚洲的教师到哈佛大学访学，超过600名亚洲合作高校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候选人到哈佛大学接受联合培养。在短短70年的时间里，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那么，这个群体最杰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对哈燕社或者说对哈佛大学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裴〕是的，如果查阅一下哈燕社资助人员名单，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亚洲最杰出的学者代表。其实，如你所知，哈燕社的使命并不重在哈佛大学。哈燕社的核心使命是推动亚洲的高等教育发展。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学者回国后做了什么。实际上，他们成果丰硕，有的学者撰写了非常有分量的著作，也有人走上了所在高校的领导岗位，有的人则成为重要的政界领袖，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亚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这并不是说哈佛大学没有从哈燕社以及这些学者的驻校访学中受益。实际上，哈佛大学受益匪浅。哈佛大学的教员无须离开哈佛校园，就有机会结识许许多多来自亚洲的最优秀的学术人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更是受益良多，他们借机认识了来自亚洲各地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員，并与其保持友好的联系。哈燕社的访问学者热情好客，即便回国后还会继续帮助哈佛大学的学生开展他们的研究。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收获更大，因为哈燕社访问学者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非正式地向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和哈佛燕京图书馆馆员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图书馆缺少了哪些重要资源，图书馆还能利用哪些额外的藏书。通过翻阅查找哈佛大学十分开放的图书资料，许多哈燕社学者（包括访问学者和访问学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了隐藏的珍宝，比如孙中山签名的图书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档案文件，特别有一些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因此，在辨别一些极为宝贵的

材料方面，这些哈燕社访问学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他们还会回到哈佛大学，或帮助我们为这些资料编目，或帮助我们宣传这些珍贵的资料，或帮助我们选定应该优先进行数字化的馆藏资料，等等。可以说，哈佛大学从方方面面都因这些学者的到来而受益颇丰。当然，所谓哈燕社，其实就是这些学者和学生组成的共同体。因此，哈燕社自身也因为受邀的数以千计的访问学者以及数以百计的访问学生驻访哈佛大学做出的贡献，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吴] 也许，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贵资料的再发掘，也是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留下的巨大遗产。这本身就是对哈佛大学的贡献。

[裴] 没错。的确如此。

[吴] 下一个问题是我今年来哈佛大学访学受启发想到的。我发现哈佛大学有很多与中国、日本、东亚、南亚或者整个亚洲相关的研究机构。我们知道，哈燕社因其独立法人的特性而与众不同，那它与哈佛大学的其他机构有何关系，比如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费正清中心”）、亚洲中心、赖肖尔日本研究所等。在哪些方面它们相辅相成？

[裴] 是的，我认为它们彼此互补。费正清中心、赖肖尔日本研究所、韩国研究所、亚洲中心等研究机构的主要使命是服务于哈佛大学。它们都是隶属于哈佛大学的中心，是服务于哈佛大学师生的中心，旨在促进哈佛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哈燕社却是一个独立法人的组织，它能为哈佛大学提供一定的支持，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编辑出版期刊以及在哈佛大学开展的各种项目，但这类资助是有限的。根据我们与哈佛大学的协议，哈燕社支持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方面的年度预算经费不得超过哈燕社年度预算总额的 30%，而其余的 70% 或更多的预算必须用于推进亚洲的高等教育发展，因此哈燕社有着和其他中心不一样的使命。

当然，因为建设哈佛燕京图书馆使哈佛大学所有的研究所（中心）及其学者都一同受益，可以说这些机构的发展相得益彰。同时，哈燕社也为他们提供举办国际会议方面的支持。如果这些研究所或中心想邀请亚洲学者来哈佛参加他们主办的会议，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项目，允许他们申请哈燕社的资金来邀请亚洲学者。比如，费正清中心召集一个国际会议，我们一起合作并提供经费来邀请亚洲学者前来与会。我们还支持哈佛大学的教

授与亚洲学者的合作，欢迎他们邀请亚洲合作学者来美国开展合作研究。这些哈佛大学的专家学者虽在其他的系科、研究所或中心，但他们也能从哈燕社的有效资源中获益。

以费正清中心为例。过去，两者的分工是哈燕社更关注传统的汉学研究，更加注重人文学科——哲学、文学、古代历史等领域的问题，而费正清中心在成立之初则更关注关于现代和当代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当费正清教授向福特基金会提出应该支持哈佛大学设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时，他说，我们需要在哈佛大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中国，而要想研究社会主义中国就一定要研究苏联，以及其他与传统汉学研究不太一样的比较研究。费正清并非叶理绥的学生，他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而不是在哈佛大学。我觉得，尽管他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时确实帮助过哈燕社，为哈燕社做了很多工作，但他的学术路径与哈燕社所倡导的不一样。他不是叶理绥、赖肖尔这一脉的学术传承，他在自传中抱怨说他曾两次或三次申请哈燕社的资助，但都被拒绝了，可能哈燕社觉得他不是那种真正接受过哈燕社训练的汉学家吧。因此，费正清中心从福特基金会获得资金，聘请了一些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加入，并逐步成为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重镇。比如，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 1934-）、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 1930-2020）和政治学家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都是费正清中心利用福特基金会的资金聘请来的。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费正清中心就是这样运作的。

当我成为费正清中心的主任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费正清中心的执行委员会的架构，使其向所有开展中国研究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开放，包括研究古代中国、中国文学等领域的同人。此前，费正清中心的执行委员会只包括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社会科学专家。我曾在华盛顿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它们拥有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中国中心，我认为这样很好，就加以借鉴。所以，我找到当时的哈燕社社长杜维明，跟他提出：“费正清中心准备面向哈佛大学的教授开放。哈燕社传统上就支持人文研究，而且比费正清中心富有得多，您能提供一些经费支持吗？”杜维明说他很乐意这样做。他为费正清中心那些与人文学科直接相关的各种会议和研讨会提供了资金支持。因此，到了这个时期，费正清中心成为哈佛大学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研究中心。同样，虽然此前哈燕社一直说自己支持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但其实是从这个时候起，哈燕社才真正开始更多关注社会科学，

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以前多很多。因此，我觉得，这两个机构现在的分工非常明确，一个更专注于亚洲且面向亚洲，一个专注于中国而面向哈佛。总体而言，它们都是真正跨学科机构，并且充分了解各自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优势。

〔吴〕您提到的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哈燕社过去几年的访问学者项目中——在支持领域上从传统的汉学、人文学科转向更多元的跨学科领域。这样理解，对吗？

〔裴〕是的，尽管一开始哈燕社决心专注于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它也是支持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地理学研究，支持了中国政治学、中国宪法等领域的研究，并试图兼顾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过，20世纪中叶以来，大部分哈燕社访问学者与其说是社会科学家，不如说是汉学家。事实也的确如此。

〔吴〕换句话说，这也是重拾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某种传统。当我梳理哈燕社历任社长的任期时，我才发现，除了叶理绥，您已经是哈燕社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社长了。过去16年，哈燕社与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合作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实现了快速发展。在您的领导下，哈燕社建立了许多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恢复或重新搭建起从前中断的合作关系，比如哈燕社与华中师范大学之间启动了许多新项目。当您回顾过去，您认为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

〔裴〕我认为我最自豪的一点是将哈燕社带回印度，并在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开设了许多新项目。我们与新加坡国立大学重新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将其作为哈燕社与东南亚其他地区建立联系的枢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高兴的新领域。另一个是引入培训项目——为新兴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学术训练。我们不仅在哈佛大学，也与我们在亚洲的合作伙伴一同发起了这些培训项目，他们对此也热情投入。实际上，所有培训项目都是合作项目——亚洲合作方和哈燕社分别邀请专家学者授课讲解，双方共同承担费用等。这类亚洲培训项目一般在合作高校进行，不过，我们也可能邀请少数受训人员前来哈燕社交流访问。我认为，这些培训项目非常有意义。

另一件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事情是与哈佛大学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尽管如我所说，双方的使命各不相同。比如，费正清中心和赖肖尔日本研

究所的使命是支持哈佛大学在校学生和教员的学术研究。但是我也认为，就哈燕社的项目而言，哈佛大学能真正从我们选拔、邀请的这些亚洲杰出学者的驻校访问中受益是非常重要的。而对来自亚洲的驻校访问学者来说，身临哈佛大学校园，与哈佛大学的教授学者以及研究生面对面交流，同样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开始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对一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导师制”（mentorship），尽管我常常听到导师说他们从访问学者身上学到的比他们实际能教授的要多。无论导师来自哈佛大学还是大波士顿地区的其他高校，我们为每位来访学者选配一位合作导师。来访学者可以选修导师的课程，与之深入交流，随时求教于导师。我们还希望导师能将来访学者介绍给自己的研究生，以便他们相互了解，这对学生和来访学者都大有裨益。

我们还增加了一项公开演讲的要求——我们要求每位来访学者就其研究做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以便哈佛大学或大波士顿地区的学者有机会了解他们的学术成果，并且有机会与他们见面交流并建立联系。实际上，这是我们对访问学者的唯一要求，就是做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在我成为社长之前，哈燕社没有这样的要求。我认为，为了让学者们更好地建立起联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不仅同一批访问学者可以相互了解彼此正在做的工作，促进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学术演讲能让他们与哈佛大学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我对这些公开的学术演讲的受欢迎程度感到非常满意，学术报告厅常常座无虚席。一些访问学者反馈说，他们在公开演讲中和演讲后收到了非常好的问题，引发了许多新的思考。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其他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也非常乐意共同赞助一些不错的项目。比如，如果是关于中国的学术报告，我们会询问费正清中心是否愿意一起赞助。如果是关于亚洲地区的比较研究的讲座，我们会问亚洲中心是否愿意共同举办，他们还能帮忙在所在机构的邮件列表上推送宣传。这样，人们就会知道我们哈燕社的学者是谁，他们的学术兴趣是什么，如果大家有相同的研究方向，彼此还能建立起联系。

〔吴〕在这之前，我还真不知道访问学者的公开讲座是您领导下的创新举措。我认为这样的安排也能让同一批访问学者更频繁地聚集在一起，相互学习。演讲也就成为同人之间互相提问、交流碰撞，学习不同领域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场合。

[裴] 没错。我认为，哈燕社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学者们能从其他学科中取经，那么这种要求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意味着在公开演讲中，演讲者必须非常清楚自己不是仅对着本学科的小圈子里的同行做报告，而是要在一个跨学科的背景下演讲，以吸引那些对自己的研究课题不太了解的人的关注，让他们觉得这一研究主题是重要的，甚至要让听众产生一种“这个主题正与我的研究兴趣相关”的感受。我认为，公开演讲这一举措的效果非常好。以前，哈燕社总为自己不对访问学者做任何要求而感到自豪。可是，我说，“好吧，我很抱歉，我要做个‘恶人’，我得提出这个要求”。一开始，访问学者似乎对这样的要求心生不满。我就告诉他们，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益的要求，我们都有责任宣介我们正在开展的研究。现在，这个要求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期待着做这样一次公开演讲——这多少都会令人产生一些焦虑，但我想大家都同意，这真的是一件互利共赢的事情。

[吴] 确实如此。您所总结的过去这些年的成绩与我的想象比较接近。下面，我特别想问一个关于 2008 年以来哈燕社设立的新项目的问题。如您所说，哈燕社现有中国的印度研究项目，也有印度的中国研究项目，两者是相对应的。哈燕社每年会从中国和印度高校中选拔博士候选人到哈佛大学学习一年。这么做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更大的构想？据我所知，这个项目目前在规模上还较小，未来，它会在规模或重要性上得到提升吗？

[裴] 嗯，我无法谈论未来，因为这是我作为哈燕社社长的最后一年，会有其他人来决定它未来的重要性，但我真心希望这些项目能继续下去，而且坦率地说，我希望它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国家，这两个邻国，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有很多共同点，佛教只是其中之一。中国和印度有很多地方需要相互学习，但我认为（我想其他人也会认同），双方对彼此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我相信中国和印度都有很大的热情推动这类项目。实际上，我几周前刚从印度回来，那里的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非常非常高。

目前，哈燕社正支持 8 位来自印度的博士生在中国的 5 所大学学习，包括您所在的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他们都接收了我们选派的博士生。还有其他几所中国大学表示愿意接收我们选拔的学生。这些高校表示，他们也希望提名和推荐

他们学校像你这样对印度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来哈燕社访学。起初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能将研究项目相似的中国和印度学者相匹配，以便他们建立起联络网，这会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因为大多数对印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往往是对印度古典艺术、佛教等感兴趣，而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印度学者对当代政治、战略问题更感兴趣。因此，想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还比较困难。不过，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哈燕社的项目能同时邀请这两个国家的学者来哈佛大学，会为他们创造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建立社群。遗憾的是，今年这批访问学人中没有来自印度的年轻学者，由于新冠疫情，印度学生直到今年才能去中国。正如我前面所说，目前我们正支持8名印度学生在中国学习，其中有7位明年会来哈燕社，他们在中国学习了一年后来哈燕社再进修一年，然后会回印度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这些印度学生非常有趣，他们非常活泼，无论是性情还是研究兴趣，通常与来自东亚的学者大不相同。对哈燕社来说，拥有一个更多元的亚洲学者社群是非常好的。正如你所说，我们在印度有几个不同的项目，它们的规模仍然相当小。现在，这些项目在印度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因为现在的印度政府正在对大学施压，尤其是在中国研究方面，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目前较为艰难。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学生对中国的研究兴趣仍然不减。尽管哈燕社的未来不是我能判断和决定的，但我认为，当前形势下，真心实意并竭尽全力确保这些项目正常运行，意义重大。

〔吴〕是的，我认为这种三方合作模式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印度学生有机会在中国高校和哈佛大学实地学习交流一年，而这种与中美两国高校教师，包括语言教师和研究指导教授的接触，能够促进青年人在这些不同的大学之间搭建桥梁、建立联系。目前，中国学者访问印度仍然困难重重，反之亦然。

〔裴〕是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吴〕所以，青年学生是中印两国增进彼此了解、促进相互交流的希望。

〔裴〕是的。目前中国学生无法去印度。我们不能将中国学生送到印度的合作高校去交流学习，但我们可以把这些年轻的印度人送到中国合作高校去。到目前为止，哈燕社已经资助支持了约20人，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正在中国学习的8个博士生。短短几年工夫，这个数字也不小了。如果这些学

生毕业后能到印度的各学院或大学工作，那他们有可能在印度建立起真正的中国研究，因为他们充满了热情。目前在中国大陆学习的所有学生去年都是在台湾学习汉语。一般情况下，如果中国大陆是开放的，他们就会先在中国大陆进行一年的汉语学习，接着进行为期一年与博士论文相关的研究，然后他们会到哈佛大学进修，最后回到印度完成博士学位。当然，这个项目需要一大笔资金投入。这些印度学生赴华学习签证很快得到了批准，他们还受到我们在中国的合作大学的热烈欢迎，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因此，这些印度学生现在还能到中国学习交流，我感到十分欣慰。如果印度方面也能如此，那就更好了。只可惜，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吴〕这真令人感叹。2008年您继任哈燕社社长以来，哈燕社发展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可以说是“联合”。哈燕社推出了很多联合博士生奖学金项目，比如哈燕社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联合项目，哈燕社与印度中国研究所的联合项目，以及哈燕社与波士顿学院利玛窦中心的联合项目，等等，还有一些涉及哈佛大学教师参与的培训类项目或学位项目（比如东亚区域研究硕士项目）。您对此有何解读？这是不是促进哈佛大学和哈燕社合作伙伴们展开国际合作的一种方式？

〔裴〕这些项目确实是为了让我们的亚洲合作伙伴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联合培养的学位项目，我们拥有的只是联合奖学金项目——由哈燕社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合作伙伴共同资助。除了哈佛大学东亚区域研究硕士项目外，其他联合奖学金项目中的博士学位都是由亚洲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事实上，东亚区域研究硕士项目并不算是我们对亚洲高等教育机构的支持，而是我们对哈佛大学的某种支持，它是哈佛大学现有研究生项目中的一部分，只是招收对象为亚洲相关高校的学生。我们希望这些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将来能返回亚洲地区，提高亚洲的高等教育水平。不过，你说得对。我们在亚洲开展的所有项目都是与亚洲合作伙伴联合设立的。为实现哈燕社推动亚洲高等教育建设的使命，我们与合作伙伴联合设立奖学金项目，并且无论合作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是印度的某所大学，这些项目学生最终获得的学位都是由我们的亚洲合作高校授予的。

我们的培训项目，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也是与我们在亚洲的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的。我们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有亚洲合作伙伴。在我看来，如今哈

燕社与合作伙伴的关系，与20世纪50年代（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建立访问学者项目时已大不相同。那时，哈燕社自身带有一种传教士式的心态，单方面为中国的高校提供支持。哈燕社认为自己用现代方法研究亚洲，并且可以教授亚洲的学生和学者如何使用这些现代化的学术方法，它有点像简单的单向传导——直接向亚洲提供资金支持，并带着来自哈佛大学的学术优越感，即使亚洲灿烂的文化原材料才是真正的瑰宝。但今天我们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可以说，所谓的研究路径、方法和阐释等，来源于亚洲的和西方的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那么，哈燕社的角色不仅仅是把哈佛大学学者的高言大智分享给亚洲学者，也让亚洲的杰出学者与哈佛大学的学生分享他们的聪明才智，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双向交流。所以，现在启动并开展的项目都是合作完成的。

在我看来，哈燕社不会在亚洲开展任何自己构想并直接去亚洲实施的项目。哈佛大会这样做，例如哈佛大学在上海设有哈佛中心，直接把哈佛大学的项目带到中国落地。但哈燕社不这样做，我们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位于亚洲的各高校开展合作，并不设立一个位于亚洲地区的“哈燕中心”。我们应合作伙伴的邀请开展工作，而不是由我们单方面建议他们应该做什么。比如，他们邀请我们启动一个培训项目时，是由他们向我们提出建议，而不是相反。我们希望能与亚洲合作高校一同实施这样或那样具体的项目。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务实合作。

〔吴〕确实如此。您一直在强调哈佛大学教授与亚洲学者之间相互借鉴，互利互惠。我还有一个问题，希望听听您的建议。您知道，中国的大学也在推动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院或研究所，包括国别或区域研究中心，过去5—10年我们称之为“高研院”。您曾任费正清中心主任4年，现在又任哈燕社社长16年之久，您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以及如何在大学推广这种跨学科研究？

〔裴〕我的建议是不要把这看作是一个智库建设。我认为，智库当然非常好，但智库和大学的科学研究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一直在高校建立许多智库，但我个人的看法是，即便在美国，大多数大型智库都设在首府华盛顿特区，这背后是有原因的。智库的主要功能是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建议，知识分子和业界名人也应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确实对任何一个国家非常重要。而在大学设立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则完全不同，因为它

们的目标不是向政府提供政策，而是提高研究机构所在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以及高水平研究。所以，这些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学生所构想的研究方法、研究的主题等都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研究机构的性质。我认为，无论是在中国、这个国家（指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大学设立的科研机构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启动和推动合适的研究项目，以便尽可能地帮助到所在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这需要与学生和教师深入交谈，了解他们真正想要做的学术研究，以及机构如何能帮助他们推动这样的研究。科研机构要为他们提供特殊的培训及有效的研究方法，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获得他们无法获得的研究资料，建立阅览室，以及给予其他一切能够给予的资源支持等。我认为，鼓励教师和学生做最好的学术研究是研究型大学的首要目的，这与智库的使命非常不同。智库的使命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我要强调，这是智库发挥作用的重要角色之一。所以，费正清中心或哈燕社也不会扮演智库的角色。在中国高校中设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心）可以仿效普林斯顿模式（指普林斯顿高研院）、斯坦福大学模式（指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或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等。它们都不是智库模式，而是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并努力创造一个全新的研究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研究人员得到巨大的支持，能全身心投入，并做出最杰出的成果。

〔吴〕您的建议也许可以纠正人们对于高研院和国别区域研究中心的一些误解。最后，我想我应该替读者问一个您本人研究方向的问题。我注意到您最近醉心于“工作队”研究，您能谈谈您为何对此感兴趣，以及最新的进展和研究计划吗？

〔裴〕好的。不过，三言两语可能无法尽兴。简而言之，我相信这是中国革命经验的遗产。中国革命对当代中国政治的长期影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认为工作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切入点，也是一个治理形式的有趣案例。从很多方面看，它最初的应用是要模仿苏联，但在中国落地时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因此，我对工作队的起源和适应性非常感兴趣。我希望能够专门写一本书来探讨工作队不同时期的变化。但目前开展这项研究非常困难，因为现在要到中国去做这项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我已经启动了这项研究，但新冠疫情暴发以及其他各种障碍使这项研究变得极为困难。现在，我几乎只能依靠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冯汉柱图

书馆的资料进行研究。所以，我对正在进行的研究做一些方向性的调整。对贵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许多学者提供的支持（包括帮助我收集了一些研究资料），我非常感激。我希望自己明年可以拥有一个期待已久的学术休假，这样，我就能够分享一些重要的新成果。

[作者单位：裴宜理，哈佛燕京学社；吴和林，华中师范大学印度研究中心]